

郁达夫散文精品文库

感伤的行旅

郁达夫

延边人民出版社

感伤的行旅

郁达夫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光华

封面设计:杰 图

郁达夫散文精品文库

感伤的行旅

作者:郁达夫 (台湾)

出版发行:延边人民出版社

经 销:吉林省新华书店

印 刷:吉林省新华印刷厂

850×1192 毫米 32 开本 13 印张 285 千字

1997 年 12 月第一版 1997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0000 册

ISBN 7-80599-669-4/I·231

定价:20.00 元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

前 言

郁达夫（1896—1945）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位成就卓著又极有个性的大家。他的作品充盈着反帝反封建的热忱和对黑暗社会的憎恶与愤激；在艺术上，他倾向于浪漫主义，勇于开拓、创新。郁达夫生前就负有盛名，作品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这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最后把自己最宝贵的生命贡献给了民族革命战争，就义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枪口下，从而更赢得了后世对他的深深景仰。

郁达夫是浙江富阳人，早年曾留学日本，1921年与郭沫若、成仿吾等共同发起成立创造社，同年，他出版了《沉沦》，这是我国第一本白话小说集。郁达夫曾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广东大学、中国公学等高等学校，并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等组织，参与营救遭到反动派监禁的廖承志等共产党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立即投身反侵略的斗争洪流，1938年春赴武汉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设计委员（其时，周恩来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务理事。同年年底，郁达夫到海外，在新加坡编辑报刊，从事抗战宣传活动，发表了大量鼓动侨胞团结抗日的文章，并担任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新加坡陷落后，郁达夫转赴苏门答腊，1945年8月因汉

奸告密而被捕，惨遭日寇杀害，时年仅49岁。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于1952年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

小说和散文是郁达夫创作生涯中着力最多的两种文体，若以数量言，以散文为最；若以成就言，两者并驾齐驱，难分伯仲。我国评论界以前对他的小说研究较为深入，对他的散文的价值认识不够充分，最近十多年来，这种偏颇已有所克服。《郁达夫新论》（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1985）的著者许子东在考察了作家的全部作品之后说：“郁达夫散文的艺术成就，实不在他的小说之下。”香港学人司马长风则说：“郁达夫的散文和他的小说一样好，而且更亲切有味。”（《中国新文学史》，香港昭明出版社出版，1976）这些都是实事求是之论，并愈来愈获得学术研究界的公认。

散文古已有之。在古代，人们将韵文以外的作品都算作散文，它与诗歌并峙而立。随着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小说、剧本、报告文学逐渐成为独立的文体，但至今对散文仍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的说法：狭义的说法专指以抒情叙事为主的文学散文；广义的说法则把书信、日记、序跋、杂感、回忆录等等也包罗了进来。书信、日记等，其实也不可一概而论，如果作者不是仅仅以之作为日常应用信笔挥就的话，何尝又不能赋予它们分明的文学色彩呢？阿英写过《论日记文学》，郁达夫也写过一篇以《日记文学》为题的文论，他们对日记文学早有精到的论述；同样的道理，书信文学、杂感文学等等名目也是可以成立的。这部《郁达夫散文》共分为十一卷，入选的作品以符合文学散文标准者为主，同时兼及其它；考虑到文学爱好者的需求，作家的创作谈和文论也择其重要者酌予编入。

随笔小品是一种篇幅比较短小、侧重于抒情叙事的散文体

式，“五四”以来，这类作品大量涌现。郁达夫的随笔也以短小者居多，但他有时出于发抒胸臆、表达情绪的需要，信马由缰起来，就不大受篇幅的约束，有若干篇竟长到万字以上。从艺术上来看，郁达夫此类作品之最出色者多数写于二十年代，如《归航》、《还乡记》、《还乡后记》、《一个人在途上》、《零余者》等，便都是代表作。

郁达夫在论及卢骚（现通译为卢梭）的《孤独散步者的梦想》时，说这部作品里活跃着“最哀婉的一个受了伤的灵魂的叫喊”（《卢骚的思想和他的创作》）。我们其实也可以把这句话移来用在《还乡记》、《零余者》诸篇上。

《还乡记》和《还乡后记》以作者从上海回富阳故里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为描写线索，触景生情，抒写感慨，既愤叹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的世相，也伤感地喷吐自己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悲哀与愁苦，出国十年归来，在上海求职无成，贫困流离，黑暗社会的摧残使得主人公精神上苦闷至极，几欲跳车一死离开这个令人忧烦压抑的世界。《零余者》也以抒写苦闷彷徨的心绪为主要旋律，诅咒人间的不平、世道的恶浊，愤世嫉俗之情几达极致。作品中有这样的句子：“对于这样混乱的中国，我竟不能制造一个炸弹，杀死一个坏人，中国生我养我，有什么用呢？”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本可有所作为的青年却只能落得“袋中无钱，心头多恨！”郁达夫所抒发的苦闷是一种时代性的苦闷，社会性的苦闷，如他在《公开状答日本山口君》中所说的那样：“在这一个军阀和外国资本主义的铁蹄下的中国青年，一般手无寸铁，知识发达，追求光明，如饥似渴的青年，那一个能不和我一样的飘泊？青年的渴求光明，是自然性，求之不得，就不得不苦闷。”由于汹涌在作品中的愤激情绪具有普遍性，所提出的问题正是广大青年热切关注并有切

肤之痛的社会问题，所以这些作品发表之后，在读者中很自然地引起了广泛的共鸣。

郁达夫的随笔小品中有不少是人物写实之作，把它们集中在一起单列一卷，可便于在阅读中进行比较，从中可以窥见作者因人而异、因旨趣不一在写法上有何不同。这一卷姑且以“人物散记”名之。

郁达夫人物写实的小品中，有写亲情的，有友人的印象速写，也有缅怀伟人的怀念篇章。它们与《还乡记》、《零余者》等诸篇文风不尽相同，其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他在描摹人物、抒写感受时，往往将热烈深沉的情感渗透在舒缓平实的记叙中，极少直白呼告式的渲泄。郁达夫善于在讲述他们的业绩和耳闻目睹的事件时，动情地描画出他们的音容笑貌和鲜明个性。《雕刻家刘开渠》截取了作者和这位当时年仅29岁的艺术家相晤的几个生活片断，记叙印象，抒写感受，在如同闲谈般的娓娓叙述中，作品一方面突出地表现了刘开渠的苦闷：艺术家那“苦闷的表情”和“表现苦闷的艺术品”，并借以揭露社会的令人窒息的状态；另一方面，他又着力于展示这位年轻有为的艺术家的人格力量和艺术良心。这篇小品不仅能让读者强烈地感受到刘开渠高尚的爱国情怀，作者对民族存亡的忧心和对伪艺术极端鄙视的情绪也打动了我们的心。《怀鲁迅》风格凝重，诗意盎然，理性之光的烛照使作者的深情得以升华。这篇作品写于鲁迅逝世之后的第五天，文中写道：“这不是寻常的丧葬，这也不是沉郁的悲哀，这正像是大地震要来，或黎明将到时充塞在天地之间的瞬间的寂静……在鲁迅的死的彼岸，还照耀着一道更伟大，更猛烈的寂光。”他还咏叹道：“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

邦。”这诗般的警句，包孕着深邃的哲理，不久就成为广为人知的至理名言了。

说郁达夫的游记是现代文苑中不可多得的奇葩，并非过誉之言。

郁达夫的游记，除《感伤的行旅》等个别篇章外，几乎都写于1933年举家迁往杭州之后。《感伤的行旅》的格调近似于《还乡记》等作，作者的心绪颇为愤懑不平：“江南的风景，处处可爱，江南的人事，事事堪哀……江南是鱼米之乡，但可怜的老百姓们，也一并的作了那些武装同志们的鱼米了。”满纸愤愤然。

迁家之后，郁达夫就很少写小说了，却出现了一个游记盛产期。郁达夫迁家杭州并非偶然之举，而是他思想发生转折的一个标志。在上海度过多年紧张的斗争生活之后，他产生了一种厌倦情绪，希冀于离开旋涡中心，去安然索居或游历，过过松弛陶然的日子。鲁迅作诗《阻郁达夫移家杭州》给他的妻子王映霞，是有针对性的。郁达夫在《二十二年的旅行》（民国二十二年即公元1933年）一文中云：“我的这一次旅行浙东，主要原因固然是因受了杭路局之嘱托，但暗地里却也有了一点散散郁闷的下意识在的。上杭州来蛰居了半年，文章也不做，见客也不见，小心翼翼，默学舍人，唯恐祸从口出，要惹是生非。”这段话坦率地道出了心迹。此为发端，几年间观光浙皖诸地，并在青岛、济南、北平、北戴河、福州等地留下了足迹，旅踪甚广，履痕处处。这几年里他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游记。郁达夫文化素养甚高，文笔清新，艺术感觉敏锐、细腻，在他的游记中，山岭瀑布的美景，古迹名胜的丰姿，各处民情风俗的独异特色，诸地江湖河川的不同风貌，都描绘得极

有个性，极为传神。他不但勾画自然风光，时而也兼写当地人物，兼讲历史典故，兼诉衷肠心曲；《半日的游程》中的老翁，《闽游滴沥之五》中娓娓道来的福州城的沧桑变故，《临平登山记》中对“民不聊生又敢死”的喟叹和对山主滥伐林木的愤慨，都给人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郁达夫一生所作的游记，以这时期的篇章为最出色，因而在发表之当时便赢得读者的广泛欢迎，至今仍然魅力不减。人们的精神需求是多样的，他们固然需要从文学作品中获得激励斗志的力量，又何尝不希望在劳作之余借助于游记小品调剂调剂生活？郁达夫笔下的游记里有江山如画的胜景，有异彩纷呈的民情生活图卷，格调清新，情趣高雅，还含蕴着丰富的人生经验，具有陶冶爱国情操和愉悦性情之效，对于今天读者的精神需求来说也是切合的。郁达夫这一时期的游记，感时忧国、抨击黑暗的成份少了，基本上属于淡雅的名士型，但他毕竟无法完全超脱时政，在《杭江小历程》中，缘义乌历史人物骆宾王、宗泽而借题发挥，文中分明寓有与入侵敌寇誓不两立的意蕴。

飘泊海外之后，郁达夫的主要作品是鼓吹抗战的时评杂感，也写过一些游记。在动荡不安中大约是很难写好这类作品的，《马六甲游记》似可算得其中的佼佼者了。

议论性的散文，在现代文学中数量甚多，被统称为杂文。它滥觞于“五四”时期。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们几乎或多或少地都写过杂文，用以张扬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想，用以冲决旧礼教、旧道德的堤坝。杂文经鲁迅的大力倡导，不仅内容不断更新，文学意味也日渐浓郁，迅速地发展起来，到20年代已蔚为大观。郁达夫的杂文也相当不少，且题材广泛，笔触伸向社会的方方面面，有的有很高的艺术性，旁敲侧击，婉而多讽，

嬉笑怒骂，妙趣横生；也有的似更注重于逻辑分析，几近于时事评论。

大致上说来，郁达夫前期的杂文笔调活泼、文字洒脱，文化、人生、政治、习俗无所不涉；及至日寇袭来，抗日战火燃起，他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救亡的斗争中，他那淡雅的名士情趣不见了，突现出了战士的本色，擂起急促的鼓点来，所作杂文，其内容也就大多与民族解放战争息息相关，举凡前线战况、后方民情、政局动向，以及日本方面的种种事态，都在他关注的视野之内。《声东击西》对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卑怯退让又自欺欺人的国民党政府作了无情的嘲弄；《山海关》中连珠炮般的反语犀利、尖刻，读者从中可以分明地感受到郁达夫心中的愤火燃烧得有多么炽烈：“日本人是宽宏量大，对中国决没有领土的野心的——这是日本人的宣言——可是中国人却比日本人更宽宏量大，对自己的领土，更没有野心，所以日本人大约也是迫不得已，只好进关来替中国人管理管理。”

鲁迅和郁达夫 30 年代初都有不少杂文发表在黎烈文执编的《申报·自由谈》上。郁达夫的有些篇章，笔法颇似鲁迅，例如借古喻今之法，郁达夫不仅也常常运用，而且往往透出鲁迅式的辛辣讽刺意味来。请看他作于 1933 年的《说木铎少年》。这篇杂文由木铎老人依仗皇帝的势力任意欺凌百姓说起，而后把锋芒指向现代的走狗文人，他俏皮地称他们为“木铎少年”，把那些“应天运而生，揭笔杆而起”的家伙的无耻，揭露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无论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这篇作品都是上乘的。

郁达夫也有一些杂文，由于应报纸急需而仓促挥就，没有更多地在构思和技巧上下功夫。他所处的时代，特别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形势瞬息万变，斗争激烈异常，他似乎也必须

经常挥写急而就章。这是我们不能苛求他的。

我们似乎可以将郁达夫的自传、日记和信札视之为他的自白书。他是一个性格极为坦率的人，他的自传、信札和日记都有着披肝沥胆般的真诚，他有时甚至把自己心灵角落里的隐秘也毫无保留地袒露在清新洒脱的笔墨里。

自古以来，书信就是人们用以沟通信息、交流情感的媒体。郁达夫也有一些纯属日常事务之谈的应用性函件；但他的多数信札，都是具有鲜明的文学性的。《海上通信》、《一封信》、《北国的微音》等，在命笔之前就想到了要公开发表，是典型的书信体小品，后来他自己把这些信件都收进了散文集子里。在这三封写给创造社同仁郭沫若和成仿吾的信件中，有自然风光的素描，有内心苦闷的独白，也有思念亲人的动情倾诉；他还向友人直抒胸臆，把对侵略者的切齿之恨、对苦难百姓的深切同情也走笔写了进来。1924年11月所作的《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是很有影响的名篇，信文内容很有思想深度。农村凋敝，都市污浊，大学毕业文凭如同废纸，得意者多在爬乌龟钻狗洞，青年人的出路在哪里呢？在这封公开信里，郁达夫那刻薄犀利的戏谑文字像利箭一样射向社会，他虽然不能为青年人指出出路在哪里，却在贮满了愤怒的揭露中毫不留情地粉碎了他们对社会的幻想。这“公开状”其实也是一篇情绪愤激、思想深邃的声讨黑暗社会的檄文。

在郁达夫的大量信札中，有许多是致文化名人的。可惜有不少早已在炮火和社会动荡中散失了。所存的这些函件，有的情文并茂，可视之为文学散文；其余的，至少也是弥足珍贵的文学史料。

郁达夫给王映霞的情书，总量恐几倍于现存者，现存仅九

十四封。这些信札大多行文笔墨酣畅，挥洒不拘法度，痴狂中如火的恋情，难捱中烦闷的煎熬，矛盾苦恼时的不安……以及其它种种难以名状的情愫，他都抒写得生动而传神。王映霞这位比郁达夫年少 11 岁的女子，她所奉献的爱情在郁达夫的人生中，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1927 年 3 月 7 日，郁达夫在日记中写道：“她激励我，要我做一番事业，她劝我把逃往外国去的心思丢了，她更劝我去革命。”有一次，他在创造社出版部工作到深夜两点，休息时写信给王映霞：“因为有了你圣洁的爱，才把我的活力唤醒了。”1927 年 8 月，他则在《鸡肋集·题辞》中写道：“闲居了半年，看了些愈来愈险的军阀的阴谋，尝了些叛我而去的朋友亲信的苦味，本来是应该去做和尚一沉到底，不去做和尚，也该沉大江的了，可是这前后却得了一种外来的助力，把我的灵魂，把我的肉体，全部都救助了。”这“救助”之力也是指王映霞的爱情。王映霞的爱情对郁达夫在事业方面的作用如此之大，与这位作家精神气质的特殊性无疑有重大关系，或者，郁达夫说得过份了些。他常常在落笔时把自己的情感夸饰一番，不仅写信时如此。郁达夫给王映霞的情书中，有不少是充满了诗意的，堪称美文，至今魅力不衰。

关于日记，郁达夫说：“散文作品里头，最便当的一种体裁，是日记体”（《日记文学》），他的《西游日录》、《南游日记》本来就是用日记体写的游记。

郁达夫另外的许多日记，只是为了备忘而笔录下当日的心绪与耳闻目睹的种种事件的，却也娓娓叙来情趣迭生，让人读起来很有兴味。他的日记之所以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与内容繁复多样也有密切关系。他在日记中对社会的不安与动荡时有所载，并常常由此引发出满腹牢骚；他对各色人等的印象也常常加以描述，并在不经意中直率地予以评议；观剧读书的感

想、与友人交往中的所见所闻等，也无不时时流向笔端。他那丰富的人生体会每每能引得读者产生共鸣或会心一笑。

中国现代作家在生前公开出版自己的私人日记，郁达夫是始作俑者；热衷于写自传的，他也是突出的一位，他起笔系统地写自传时，年仅38岁。日记和自传大约是最能表现自我的文体。他的自传笔调、章法自然活泼，富于情趣，各篇相对独立，却又前后连贯，可惜只写了九章（第九章写的是留学日本时期的生活）就中断了，究其原因，大约因为其时日寇已大举侵华，他投身于抗战救亡，已无暇顾及这方面的著述了。

我们从郁达夫的自传中，可以清晰地了解到他青少年时期那段痛苦、曲折的人生历程，自传中对社会的变迁（如清末的腐败、农村的破产、革命浪潮的汹涌澎湃等）也有生动的反映，时代气氛鲜明。除了自我形象给读者印象甚深而外，那些与主人公有过交往的各类角色，也有不少写得具有鲜明的个性。尤其有必要提一提的，是他满怀深情地描绘了几位处身于下层社会的劳动人民形象。女仆翠花既善良又勤劳，但命运不济，先是嫁给人作了填房，后来又成了寡妇，她的遭际使人不期然地想起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来；而家境贫寒，小小年纪就得上山砍柴的小友阿千，在主人公心目中则是一位“小英雄”，岂不又类似于《故乡》中的闰土？郁达夫在《薄奠》、《春风沉醉的晚上》等小说中，浸润着对车夫、女工等劳苦大众的人格尊重，流溢着对他们生存困境听人道主义伤感，与此似一脉相承。

在这些自传作品中，郁达夫时而用白描手法写实，时而用彩笔描画风景，时而用诗一般的语言抒情，时而又发自胸臆地展开议论，互相交融得十分妥贴自然，表现力甚强，显示了练达的艺术工力。

若说郁达夫是文学理论家，未免言过其实；但他的某些文学见解，特别是对于散文创作的见解，确颇多精到之处，不仅在当时，就是现在看来也还很有价值，是符合事实的。他的创作谈也值得重视（他的创作谈有的写成了专文，有的散见于序跋中）其中有些弥足珍贵的经验，至今仍可供我们学习、借鉴。

这里需要特别说一下的是《关于黄仲则》、《屠格涅夫的〈罗亭〉问世之前》、《卢骚传》、《卢骚的思想和他的创作》等几篇，我们特意将这些文章组合在一起，是因为黄仲则、屠格涅夫和卢骚等中外文学家不仅为郁达夫所推崇，而且他们确实对郁达夫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郁达夫那“内热”、“沉郁”的感伤，那主张文学作品应该是“自叙传”的美学观念，那注重于抒情释愤的浪漫主义倾向，并非自发形成的，而是一种自觉的追求。如果没有上述中外文学家的影响，这种自觉追求就不可能产生。在上述文章中，郁达夫对此有明确的阐述。

关于卢梭，郁达夫写过的文章除上述两篇外，还有几篇，他还翻译过卢梭的作品。他写作关于卢梭的文章，起因是由于梁实秋教授在大学的讲坛上推崇白璧德主义而对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颇有微词，并且有贬抑浪漫派文学的言论。这是郁达夫所不能容忍的。由于有这种针对性，他就不止正面论述、评介卢梭，还愤愤然地对贬抑者加以冷嘲热讽，以嗤之以鼻的口吻指责人家是“小人国的矮批评家”；他写道：“喜马拉雅山的高，用不着矮子来称赞；大树的老干，当然不怕虵蜂来冲击。”又说：“不幸的卢梭，当他活在世上的时候，既受了同时代文人的嫉妒攻击而发了疯，直到现在，还有许多英美派的正人君子……说他是‘一无足取’。小人国的矮批评家，你们即

使把批评眼装置在头顶上发上面，也望不到卢骚的脚底，还是去息息力，多读几年卢骚的书再来批评他罢。”（《卢骚传》）卢梭是法国近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启蒙主义运动的思想家和活动家，主张“天赋人权”，他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不平等社会的抗争精神，对大自然美景的出色描绘，都是郁达夫十分敬佩的。郁达夫的观点并非没有偏颇之处，但我们从他评论卢梭的一系列文章中，无疑可以加深对这位作家的思想与创作的理解。

在散文创作上，郁达夫是位多面手。举凡小品、游记、杂感、日记、书信、自传、序跋等等，十八般武艺，没有他拿不起来的，各种散文体式，他样样都留下了不少佳作精品，殊不易也。

郁达夫的作品，生前死后都受到一些人的诟病，特别是他每每情不自禁地写到性苦闷、性骚动现象，更被若干评论者目为颓废，尤以小说为最。平心而论，这方面他是落笔多了些、滥了些，也有显得病态的地方，但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他是在描写青年人的人生苦闷时涉笔到性爱的领域的，社会的压抑使人们难以承受，更令生命力正在漫涨的青年尤感苦闷，这也不免在性的方面表露出来；何况在“五四”时期，这也是向封建卫道者的禁欲主义作挑战的一种手段。好在郁达夫在这方面的描写大体上说来是讲究分寸的，并没有露骨的渲染，散文尤其是这样。病态之处也有。例如《归航》。那位人生际遇坎坷心境苦闷的主人公，在航船上仰头朝楼上一等舱上“见有一个年约十八九的中西杂种少女，立在船楼的栏杆边上，在那里和一个红脸肥胖的下劣西洋人说话”时的一番感叹，就有些不着边际。“我”对西洋人与“杂种少女”以及他们的关系并

不了解，只因这少女美丽，他们又正在说话，就愤愤然了：“我的半同胞呀……像你这样的美人，万一被他们同野兽一样的西洋人蹂躏了去，教我如何能堪呢！你那柔软黄黑的肉体被那肥胖和雄猪似的洋人压着的光景，我便在想象的时候，也觉得眼睛要喷出火来……啊啊，中国可亡，但是中国的女子是不可被他们外国人强奸去的。少女呀少女，你听了我这哀愿罢！”接下去又有一段性骚动的心理描写：“我”过了一阵之后，再度“回到甲板上来，立在那少女立过的楼底直下……心里只暗暗地想：‘我头上那一块板，就是她曾经立过的地方。啊啊，要是她能爱我，就教我用无论什么方法去使她快乐，我也愿意的。……事也不难，她立在我头上板上的时候，我只须用一点奇术，把我的头一寸一寸的伸长起来，钻过船板去就对了。’想到了这里，我倒感着了一种滑稽的快感。”这联想很是唐突、畸形。郭沫若对郁达夫早期作品中常有的这类描写有过这样的分析：“……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的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到做假的困难。”（《论郁达夫》）这或许是一种比较能说得通的解释，说明了在当时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好在即使这样的作品，虽存在病态的成份，从总体上看也还是瑕不掩瑜的。

编者

1992年4月

目 录

志摩在回忆里····· (1)	刘海粟教授····· (85)
光慈的晚年····· (7)	为郭沫若氏祝五十诞辰·····
雕刻家刘开渠····· (12)	····· (87)
追怀洪雪帆先生····· (15)	敬悼许地山先生····· (89)
记耀春之殇····· (19)	苏州烟雨记····· (92)
送王余杞去黄山····· (22)	感伤的行旅····· (103)
记曾孟朴先生····· (24)	钓台的春昼····· (122)
王二南先生传····· (28)	半日的游程····· (130)
怀四十岁的志摩····· (37)	杭江小历纪程····· (134)
记富阳周芸皋先生····· (40)	浙东景物纪略····· (153)
怀鲁迅····· (44)	西游日录····· (167)
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 (46)	杭州····· (185)
回忆鲁迅····· (48)	玉皇山····· (191)
与悲鸿的再遇····· (71)	临平登山记····· (195)
再见王莹····· (74)	出昱岭关记····· (200)
悼胞兄曼陀····· (76)	游白岳齐云之记····· (205)
印人张斯仁先生····· (79)	屯溪夜泊记····· (214)
悼诗人冯蕉衣····· (81)	桐君山的再到····· (219)
紫罗兰女士速写像题记·····	南游日记····· (223)
····· (83)	雁荡山的秋月····· (234)